

“伟大斗争中产生的伟人”

□ 齐 彪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人鲜明的政治品格；党“一出生就铭刻着斗争的烙印”。这种“品格”及“烙印”是通过具体的中国共产党人体现出来的。邓小平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他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伟大的一生，他对党、对人民、对国家、对民族、对世界作出了突出贡献，功勋彪炳史册、永励后人。习近平总书记称邓小平是从“近代以来伟大斗争中产生的伟人”。邓小平一生最为辉煌的篇章，是带领党和人民赢得了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斗争，这使他作为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而载入史册。

我国的改革开放就其历史地位和影响来说，不亚于一场革命。邓小平称之为“第二次革命”。这场通过对原来社会主义“母版”不断进行渐进性改革而实现的革命飞跃，带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诞生，不仅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历史命运，而且改变了世界的历史进程。改革开放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

在一定历史条件下，通过改革实现社会变革，其斗争极为曲折复杂，历时更为长久。纵观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改革失败者不胜枚举。新时期以来中国改革的成功是世界历史上极为鲜见的范例。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要从过去的思路中走出来，必须通过改革走出一条新路。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这是一场不同以往的伟大斗争。如斗争的对象，已不简单是过去阵线分明的“阶级敌人”，更多的是党内外同志的思想斗争；又如斗争的手段，主要也不是对敌斗争及阶级斗争的方式，更多的是以处理人民内部的“团结—批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等非对抗性方式解决矛盾和问题；再如斗争的目的，也不简单是战胜某一个具体集团，而是促进全党全社会思想的统一和党的事业的发展。这种斗争特殊性，对我们这样一个

长期处于革命及阶级斗争环境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考验。

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久经革命斗争考验的邓小平走到了历史前台，引领党和人民通过新的伟大斗争走上了一条新的民族复兴道路。

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在总结“坚持敢于斗争”这条党的百年成功经验时指出，“党和人民取得的一切成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不是别人恩赐的，而是通过不断斗争取得的”。坚持敢于斗争贯穿党领导改革开放的全过程、各方面。邓小平要求对各种妨害四个现代化的思想习惯进行长期的、有效的斗争；与“一切反社会主义的分子”的斗争是“一种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要“防止一些同志，特别是一些新上来的中青年同志在日益复杂的斗争中迷失方向”。邓小平对新的伟大斗争的清醒认识及充分精神准备，是他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遇事冷静、处变不惊甚至临危不乱的重要前提。

围绕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历史主题，邓小平依靠党和人民，通过各种形式的斗争，打开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新通道。在科学评价毛泽东这一根本问题上，既坚决反对“两个凡是”的教条主义态度，也坚决顶住“非毛化”错误思潮，在充分肯定毛泽东伟大功绩的同时，实事求是指出毛泽东晚年错误，同时把毛泽东晚年错误同毛泽东思想区别开来。科学评价毛泽东和党的历史，为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继续前进奠定了坚实历史基础。

在开辟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一根本问题上，既坚决反对“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企图“走回头路”及否定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的“左”的思想倾向，也坚决反对企图动摇四项基本原则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指出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在对外开放这一重大问题上，既反对固步自封、闭关自守倾向的阻碍，也反对全盘西化、丢失自我倾向的干扰。在“两个文明”建设这一重大问题上，既坚决纠正过去对物质文明建设重要性认识

不够的失误，又下决心纠正“一手硬、一手软”的状况，强调只有“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加快改革发展与保持社会稳定这一重大问题上，既强调全面改革，加快发展，隔几年上一个新台阶，克服“谨小慎微，不敢解放思想，不敢放开手脚”的“怕”的情绪，又强调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中国不允许乱，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

在创造良好国际环境与维护国家利益这一重大问题上，既要求不要四面出击，到处树敌，又要求坚持我们的原则立场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鲜明宣示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在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这一重大问题上，既要求扩大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又要求加强党的领导，认为改善党的领导“不是削弱党的领导，涣散党的纪律，而正是为了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和加强党的纪律”，对政治体制改革做了许多有益探索。在这些斗争中，邓小平思想敏锐、目光远大，多谋善断、举要驭繁，总是站在国内大局和国际大局相互联系的高度审视中国和世界的发展，善于从全局上思考问题，善于在关键时刻作出战略决策。这体现了他驾驭各种复杂矛盾、正确处理各种棘手问题的高超能力。

在邓小平的领导下，我国的改革开放由局部发动走向全面展开，上世纪90年代初又进入了加快推进的新阶段，改革构成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伟大斗争中展现的鲜明特点，不仅丰富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斗争精神的历史内涵，也树立了弘扬和恪守中国共产党“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伟大建党精神的光辉典范。

强大的斗争定力。斗争定力来自于共产党人的信仰和精神支柱。邓小平说：“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他坚

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面对国际国内政治风波，他冷静观察、从容应对，要求“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这种内在定力，是我们应对各种风险挑战、面对各种尖锐复杂斗争的强大底气。

坚定的斗争立场。我们党讲的斗争，不是为了斗争而斗争，也不是为了一己私利而斗争，是为了人民、国家、民族，为了理想信念而进行斗争。邓小平曾经写道：“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他反复强调，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方针政策和作出决断的出发点和归宿。这种坚定鲜明的人民立场，是邓小平坚持敢于斗争的基点，是中国共产党人应该坚守的力量源泉。

大无畏的斗争勇气。邓小平身上始终洋溢着一种革故鼎新、一往无前的勇气，一种善于创造性思维、善于打开新局面的锐气。他思想解放，视野宽阔，认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他敢破敢立、敢闯敢试，强调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这种勇气是邓小平坚持敢于斗争的鲜明特色。

高超的斗争艺术。面对各种矛盾和斗争，邓小平把斗争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根据形势需要，驾驭局势，因势利导，把握时、度、效，及时调整斗争策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前进阻力，使党始终处于主动地位。

伟人已逝，但事业和精神永存。新时代进行的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是邓小平等伟人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而斗争历史的接续。邓小平是我们后人追随的光辉榜样。



河北省邯郸市是一座有着3100多年建城史的国家历史名城，在该市的中心建有新中国成立后首座大型革命纪念建筑——晋冀鲁豫烈士陵园，被列入国家级烈士纪念设施。

进入陵园大门，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巍然矗立的烈士纪念塔。纪念塔高24米，整体呈方形锥体。塔身顶端是直入云霄的红色五角星。塔身正面，上部镶嵌着红色五角星，中部镌刻着毛泽东的题词“英勇牺牲的烈士们千古 无上光荣”；其余三面，上部均镶嵌着带有党徽的勋章，中部则分别镌刻着刘少奇的题词“永垂不朽”，周恩来的题词“革命先烈永垂不朽”，朱德的题词“你们活在我们的记忆中 我们活在你们的事业中”。纪念塔台基上建有青石祭坛，正面为白色大理石浮雕，图案为金色火纹与云纹环绕着的红色五角星；两侧分别是林伯渠题词“凛冽千秋”、董必武题词“血染沙场气化虹 捐躯为国是英雄 四民安享新生活 奠酒供花岁祭隆”；背面镶嵌着一块由橄榄枝和火炬簇拥着的黑色大理石石碑，上刻晋冀鲁豫边区参议会关于建立邯郸烈士陵园的决议，全文如下：

晋冀鲁豫边区参议会 决议
第一届第二次大会
为纪念边区子弟兵光荣牺牲之烈士，在邯郸建立陵园纪念八路军总部前方司令部政治部、晋冀鲁豫军区及一二九师牺牲烈士；在长治建立决死队烈士陵园，纪念决死队牺牲烈士。

号召与教育广大群众，热烈欢迎对国家民族有丰功伟绩因复员而还乡的抗日军人，多方予以爱护尊敬与帮助，使其在精神上得到安慰，生活上得到保障。对革命烈士要发动遍及各个角落的纪念运动，搜集与表彰其英勇事迹，以昭民族正气。

一九四六年三月

陵园于1946年3月奠基，历时4年半，于1950年10月落成。烈士陵园的建立，既标志着党和人民对英烈的怀念，也开创了新中国打造红色基因库，以英烈事迹传承红色基因、彰显民族正气的先河。以《决议》为碑文，用真实的历史、平实的语言，阐明了陵园建立的意义，读来令人思绪万千，深受教育。

为力彰英烈事迹而建。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党中央的派遣下，八路军一二九师挺进太行，转战平原，开辟了涵盖陇海路以北、津浦路以西、正太沧石路以南、汾河以东，横跨山西、河北、山东、河南四省190多个县的晋冀鲁豫边区。该区战略地位非常重要。一方面，其境内山岳平原互为依托，部队可以进退自如，便于机动；另一方面，边区西接晋绥，可以沟通华北与陕甘宁总后方的联系；东连鲁、苏、皖，可以呼应华东；北面则是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与本区互为表里。这就决定了，由晋冀鲁豫边区向东南西北任何一个方向出击，都可以截断敌人的交通运输线；与此同时，敌人对边区的外线进攻，又必然会受到周围各区的环击。所以，无论是抗日战争时期还是解放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都是我党坚持革命斗争的一个战略要地。

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边区更是成为八路军总司令部和中国共产党党中央委员会北方局的所在地，是华北游击战争的心脏与神经中枢。自1937年冬开始创建到1948年8月与晋察冀边区合并，晋冀鲁豫边区历经11年的革命岁月。在这4000多个日夜里，党团结带领人民历经

彰英烈事迹 昭民族正气

——晋冀鲁豫烈士陵园纪念塔碑文敬读

□ 李 芬 刘银松

成千上万次浴血奋战，粉碎了日本侵略者的凶残“扫荡”和“蚕食”，击退了国民党军队的不断挑衅和进攻，消灭了数以百万计的敌人。在这片热土上，数十万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为了人民利益、为了新中国而斗争、而流血，甚至献出宝贵的生命。八路军副参谋长、八路军前方总部参谋长左权，1942年5月在山西麻田十字岭突围战中为掩护总部机关撤离而壮烈牺牲；八路军总部后勤部政治部主任谢翰文在战斗中不幸被日军所俘，在狱中虽受尽酷刑而坚贞不屈，于1942年夏末秋初被日军残忍杀害于太原市郊……一寸山河一寸血，一杯热土一杯魂。烈士英名与日争光，纪念塔是胜利的象征，它表明：对一切为国家、为民族、为和平付出宝贵生命的人们，不管时代怎样变化，我们都会永远铭记他们的牺牲和奉献，永远给予他们极大的荣誉和敬仰。

为昭民族正气而建。以国之名褒扬纪念，是缅怀与铭记，更是致敬与传承，致敬他们的奉献与牺牲，传承他们的遗志与精神。1945年6月17日，为追悼自建党以来24年间中国革命队伍在各个战线上牺牲的先烈，根据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定，延安中央党校大礼堂举行了“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大会决定，在延安清凉山建筑中国革命死难烈士纪念馆，并酝酿抗战胜利后建立烈士陵园。之后，由于国民党军队对延安的大举进攻，纪念塔及烈士陵园建筑地改在晋冀鲁豫边区。

英烈精神，人民共仰，纪念塔是力量的象征。其意义正如党的七大代表及延安人民代表追悼中国革命死难烈士祭文中所写的：“你们的事业已深印在人民的心中，你们的牺牲流血已有结果。你们光荣的名字是在照耀着我们，你们的英雄主义是在激励着我们，我们一定会像你们一样奋不顾身，继续踏着你们的血迹前进。”1950年10月21日，晋冀鲁豫烈士陵园举行了隆重的落成典礼。奉中央人民政府之命，典礼当日，将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左权将军及杨裕民、何云、张衡宇、高捷成、赖勤、陈光华诸烈士灵柩自涉县移葬于陵园，并举行公祭。盛大的公祭仪式，既祭奠了英烈之忠魂，也极大地鼓舞了当时中国人民和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斗志与豪情。

延安时期我们党如何领导工业生产

□ 许 峰 王子东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在此后的13年时间里，党中央带领陕甘宁边区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边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陕甘宁边区自然条件恶劣、生产水平落后，军民经常食不能果腹、衣不能御寒，加上国民党对边区实行断供、断邮的财政封锁政策，加上日军对边区屡屡发动进攻，边区的生存发展面临重重困难。党中央适时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政经济工作总方针，积极领导工业生产，取得了较大成效，积累了宝贵经验。

着力培育和壮大轻工业。延安时期，尤其是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军事包围、经济封锁，“不准一斤棉花、一粒粮食、一尺布”进入边区，导致边区工业品从武器弹药到衣帽被褥都处于严重短缺的状态。为此，我们党主张优先发展军事工业以保障抗战的需要，充分利用优势资源发展有比较优势的工业产业，积极发展轻工业满足群众的日常需求。首先，优先发展军事工业，保障军需的同时满足一部分民用。1938年3月，边区成立军工局统一管理军事工业，将原有的红军兵工厂分拆整合，陆续组建了军工局一、二、三厂，延安通信材料厂、紫芳沟化学厂等军工厂，后来发展到10余家，工人由100余人发展到1300多人。这些兵工厂生产了大量武器弹药、药品和医疗器械，为八路军坚持抗战提供了物质支持。其次，充分利用边区优势资源发展工业，保障自

给。陕甘宁边区有较为丰富的石油、盐、煤、铁、牲畜、皮毛、药材等资源，在边区党委政府的鼓励和投资下，部分工业产业取得了较快发展。1938年在边区政府万余元的投资和技术人员的努力下，延长油厂复产，经过多年经营，不仅满足了边区燃料油的需求，副产品煤油、石蜡和石墨的供给也大幅提升。盐、皮毛、甘草被称为“三边三宝”，边区人民积极投入到这三种特产的生产中，使之发展成为边区重要的财政来源之一。最后，发展能满足群众日常需求的轻工业。从1939年成立新华肥皂厂年产2万条肥皂，发展到1944年年产量增加至62万条，不仅完全满足边区人民的日常需求，而且能够部分销售至周边地区。经过多年的建设和发展，边区由一家造纸作坊发展到拥有12家公营造纸厂，到1944年总产量达1.5万令，能够完全满足边区的用纸需求。

重视新技术的研发和推广应用。陕甘宁边区的科学技术，主要还是代相传、效率低下的手工业技术。近代科学知识和技术在边区还是新事物，而新的工业产业的发展又必须靠近代科技提供支撑。为此，党和边区政府采取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措施。第一，制定奖励办法，鼓励创新。在党和边区政府的鼓励下，边区的创新意识浓厚，基于实际需求的新发明不断涌现。比如，华寿俊和王士珍用黑豆皮、黑格蓝根、黄白刺根等植物提炼制作染料，新华化学厂成功试制出酒精，难民纺织厂改进纺织机器和漂染

技术以提高生产效率。第二，开办展览会，宣传推广新技术。1938年1月，边区政府举行延安工人制造品竞赛展览会，展出了布匹、毛巾、鞋袜、纸版、铅板、汽油和各种副产品，以及手榴弹和修配的步枪、机关枪、迫击炮等军用品。展会不仅展示了新工业产品，而且促进了新技术的交流与推广。鉴于本届展会的良好效果，边区政府于1939年5月起多次举办边区工业展览会，大大激发了边区群众的生产热情。第三，在报纸上开设专栏，普及知识。1938年10月《新中华报》开辟“经济建设”专栏，1941年5月《解放日报》创刊，于同年10月开设“科学园地”专栏。这两个专栏邀请了各方面的专家撰稿，先后发表了《抗日肥皂制出经过》《石油是怎样提炼的》等许多与工业相关的科普文章，为新技术的普及作出了贡献。

千方百计培养使用科技人才。抗战初期边区的工业人才主要来源于经过长征到达陕北的老军工和全面抗战爆发后到延安的工业界人士，二者人数都非常少，到1939年全部工人也就700人左右。随着国民党政府对边区封锁的加剧，外部人才越来越难以进入边区。面对为了发展工业而产生的巨大人才缺口，党和边区政府积极采取措施，从边区内部培养使用科技人才，激励群众发明创造新技术。一是提高技术人员的待遇。1939年边区党委发布《关于吸收知识分子》的指示》，加强对知识分子的领导和吸

纳。为了落实指示精神，各地各部门纷纷制定具体措施优待有专门特长的人才。二是建立专门学校或开办培训班，培养人才。1937年9月，林伯渠、吴玉章等人发起成立陕北公学，以“实施国防教育，培养抗战人才”为办学方针。1939年中央创办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1940年改为延安自然科学学院，成为我党历史上第一所理工科大学。此外，边区政府还先后成立了陕北通信学校、延安摩托学校、延安药科学校等中等学府，这些学校数年间为边区培养了一大批各领域人才。各工厂也积极开展短期培训班以期能够快速扩大工人队伍，如成立艺徒训练班，采取半工半读的方式培训人才。三是成立科学社团整合人才资源。为了进一步广泛地组织和团结自然科学界人士，边区开展了自然科学运动，并于1940年成立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该会下设机电学会、军工学会、冶炼学会、生物学会、地矿学会等10余个分会，有效整合了边区的人才资源，为边区的自然科学运动和工业建设作出了贡献。四是通过“劳动英雄”塑造新的劳动者。每一届的边区博览会上都把先进人物作为“劳动英雄”进行表彰。在工业领域，最著名的“劳动英雄”要数赵占魁。1942年9月，边区总工会发出通知，号召全边区的工人向赵占魁学习，掀起了一个广泛学习赵占魁的运动，人们结合自身生产实践在工艺创新上取得了许多成绩，提高了生产效率。

为了新中国 ——革命烈士纪念碑碑文敬读